

CIYU XUE XI
YU SHI YONG SHUYAO

■ 李行健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词语

学习与使用述要



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

李行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已存

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

CIYU XIUXI YU SHIYONG
SHUYAO

李行健 著

封面设计 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4 插页 178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9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093—2/H·6

目 录

关于语言社会本质的一个问题	
——代前言·····	(1)
论“语言美”·····	(11)
词语的学习、运用和积累·····	(23)
词语的规范问题	
——兼论汉语规范工作中的一些分歧·····	(40)
语文教学中的词语解释工作·····	(61)
概念意义和一般词义	
——从“国家”的词义是什么说起·····	(76)
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关于“养病”“救火”“打抱不平”等 词语的结构·····	(85)
成语词典收词的规范性及其他	
——读成语词典札记之一·····	(101)
成语释义中的一些问题	
——读成语词典札记之二·····	(115)
成语词典收词、立义和例句方面的问题	

——读成语词典札记之三·····	(136)
关于旧体诗词中的成语典故问题·····	(153)
也说“江”“河”	
——从“江”“河”含义的变化看词义的发展和 词语的训释·····	(168)
《世说新语》中副词“都”和“了”用法的比较·····	(193)
“骗”和“骗马”简说	
——词典编辑和词义考释中的一些问题·····	(208)
试论方言词的产生和今后的发展·····	(217)
方言词语在训诂中的作用·····	(238)
河北方言中的古词语·····	(250)
后记·····	(260)

关于语言社会本质的一个问题

——代前言

语言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由于受到“左”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在认识上曾出现过严重的混乱。而语言理论上的“左”的错误，又曾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来搞“阴谋语言学”。他们为了破坏语文工作，搞乱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以极左的面目竭力推行“语言有阶级性”的谬论。他们把“语文无用”论和“语言有阶级性”论，作为扼杀我国语文工作的两根大棒，打击语文工作者，抹杀语文工作的成绩和作用，给语文教学、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词典编纂乃至整个语言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其实，“四人帮”一伙宣扬“语言有阶级性”论的论据是非常可笑的。如依据“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断定“人有阶级性，人说的语言当然也有阶级性”，甚至提出什么“法家语言”、“儒家语言”，强求词典编纂“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把封资修的词汇赶出词典”，对语言中的每个词都要作“阶级分析”等等，谁如果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就被说成“全民服务”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四人帮”的这种“庸俗语言学”、“阴谋语言学”根本不值一驳。当时因为他们窃取了

党和国家极大的权力，不许人们驳斥他们的谬论罢了！

“语言有阶级性”论的出现，不自“四人帮”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的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马尔，就宣扬过这种谬论。斯大林早已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沉渣泛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的。马尔当时宣扬“语言有阶级性”论，主要出自一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认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宣扬“语言有阶级性”论，则完全是为了否定党领导下的语文工作，打击广大的语文工作者，恶毒地攻击周恩来同志，为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语文》等报刊，已发表了一些文章对“语言有阶级性”论进行痛击（参看《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党的语文工作不容破坏》和1978年第3期《语言没有阶级性》等文章），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次斗争却没有对导致“语言有阶级性”论的基础，即“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进行清理，就显得很不够了。因此，本文的意图不在于对“语言有阶级性”论本身进行再批判，而是探索这种谬论产生的过程和根源，以期达到从思想上、理论上正本清源，肃清“左”的影响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特别在斯大林1950年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后，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具有民族的全民性，这些认识早已成为我国语文工作的正确指南。但是，由于我们在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只注意了反右，没有注意防左，一些同志总以为左比右好，导致了“左”的思潮的泛滥。在文化革命

前，虽然没有人公开提出“语言有阶级性”论，但由于一些同志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并不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使得人们对语言的社会本质，不是始终强调它作为交际工具的全民性，而是在一个时期突出地强调“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把它作为语言“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不难看出，“阶级斗争工具”论正是“语言无阶级性”到“语言有阶级性”论的桥梁。因为，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同“国家”“政党”“军队”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很自然地就会引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对“语言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判，才能彻底肃清“语言有阶级性”论的流毒。

1961年，我国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新建设》杂志上谈到语言的社会本质时指出：“语言是生产斗争的工具，这是容易理解的论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则是一般人所没有理解的。”（《新建设》1961年10月号，35页）这就说明，“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当时新提出的一种论点。在这前后，全国各地报刊同时出现过一些类似的提法。如说“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更重要的是以宣传工具的形式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语言是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中国语文》1960年12期，440页）有的同志更引经据典地论证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了“毛主席最明确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语言又是作为阶级宣传和斗争的武器而存在的”结论（《辽宁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1960年第2期，57页）。这些同志反复强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武器）才是语言“更重要的”社会本质，极力要把

语言的本质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以免犯脱离阶级斗争的右的错误。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是根本不正确的。

主张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同志，他们立论的根据，归纳起来是：一、“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阶级对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从本质上理解语言不仅是生产斗争的工具，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光明日报》，1961年1月4日第2版）二、“阶级社会里人们一切活动都是有一定的阶级内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语言当然也可以是不同阶级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交际其实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分别见《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132页；《新建设》1961年10月号，35页）

我们认为，根据上述两点理由，是不能判定“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试问，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或集团，对什么东西可以是漠不关心的呢？阶级社会中人的行为又怎能不带阶级性呢？如果按这两条标准来区分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得出阶级社会中凡是同人有关的事物统统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结论。而这显然是成问题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出一种东西不可以被某一阶级用来为自己服务。比如，生产工具、交通工具，阶级或集团对它们绝不会漠不关心，阶级社会中的人使用它们也必然要为本阶级服务，它们当然也具有上述那些同志论断语言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特点。但是，人们并不把它们叫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也没有人去考虑它们是否具有阶级斗争工具的特点。如果把什么东西都叫“阶级斗争的工具”，实质上也就无所谓“阶级斗

争的工具”了。由此可见，划分阶级斗争工具的标准应该从事物的内部本质属性上去找，而不能在事物外部以及人们对它的主观态度上去找。不同阶级的人极力想运用语言来为自己服务是一回事，而语言的社会本质毕竟是另外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谈到阶级斗争的工具时，通常都指的是政党、国家以及体现国家职能的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等。以“国家”来说，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它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阶级的消灭而趋于消亡。它本身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举的其他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如军队、政党、法庭等等，也莫不具有同国家一样的本质特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共同特点加以概括地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1433页）这就让我们看到，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阶级斗争中，具体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一般总是专属于某一特定阶级的，不存在一种各个阶级都可以共同使用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作的唯一的“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1872年的德文新版序言中，他们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就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能为共和派资产阶级服务，建立起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没有君主

的君主制’共和国，但是，要对资本的权利和‘神圣的私有制’的权利实行一种并不是消灭而只是严重地削减或限制的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绝对办不到的”（《列宁全集》第25卷，359—360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只能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般它只能为所属的某一特定阶级使用，它的产生和发展以至消失，都取决于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可是，语言却不同，它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它的产生和消亡同阶级的产生和消灭完全无关。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阶级消灭了，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语言不仅不会消亡，反而更加需要高度地发展。阶级对语言虽然不是漠不关心的，但语言却绝不可能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如果那样，它就丧失了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因此，语言根本不具有阶级斗争工具的特点，它是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阶级服务的。

还应该指出，引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话，并不能帮助那些同志证明“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比如有同志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说：“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这无疑是对语言本质的进一步揭示。而毛主席在他丰富的语言理论宝库中，对语言的本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揭示。毛主席最明确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语言又是作为阶级宣传和斗争的武器而存在的。”（《辽宁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1960年第2期，57页）这些同志以为，

斯大林说的“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就是阶级斗争，自然语言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讲话，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而宣传工作又被认为离不开阶级斗争，它运用的工具又是语言，据此，就证明了毛主席最明确地指出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这就是那些同志论证斯大林和毛泽东认为“语言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逻辑推理。实际上这是不能成立的。

斯大林仅只说“语言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而“社会”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社会斗争的工具”不等于“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斯大林所指的“社会斗争”可以包括阶级斗争在内。不妨看看斯大林是怎样阐述这个问题的：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64年版，1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可见，斯大林指出语言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仅仅是在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交流思想又是经常极端必要的

“这个意义来说”的。除此之外，就根本谈不到语言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问题。如果把斯大林这句话，理解为在阶级社会中就指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是不正确的。很难设想，斯大林会把应列入阶级一类范畴的东西，在这里随便用一个笼统的“社会”来代替。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谨慎地从不使用阶级一类的字眼，并极力排斥它们，就在于他认为语言同阶级一类概念是不相容的。所谓“社会斗争”，是把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包括矛盾对立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谈斗争的。“社会斗争”可以包括阶级斗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和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的专门特点”，“是作为人们交际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互相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同上书，24页）。这就是说，社会没有语言，就不成其为社会，敌对的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并进行斗争。“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性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同上书，12页）显然，语言同阶级斗争工具的特点根本不同。语言对生产斗争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斯大林正是从人类社会的一切斗争都离不开语言这个意义上，才提出“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的正确论断的。语言只能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而绝不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社会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把语言说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远不能概括它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

用的。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最明确地”指出过“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前面引证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不可能把语言列入阶级斗争工具中去。阶级社会中的宣传工作，自然有阶级斗争的作用，但是否凡是宣传作用的工具，如纸笔墨砚之类，都能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是不可以的。就宣传工作的内容来说，它们是属于思想意识文化范畴的东西，当然可能有阶级性；但是，“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2页）。这就是说，阶级之间进行斗争，开展宣传，都要通过共同的语言这个中介，使自己的思想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成为对方可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此，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工具。

有些同志强调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用意可能在于让人们注意阶级斗争对语言的影响。由于夸大了阶级斗争和它的影响，结果却歪曲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很容易滑入语言有阶级性的陷阱。因此，当他们把语言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时，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要么承认语言有阶级性。要么就硬说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阶级性。二者必居其一。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走得太远，径直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问题，所以只能抹煞阶级斗争工具的阶级性。于是出现了一种无阶级性的阶级斗争工具。他们十分牵强地

说：“语言是阶级宣传和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决不排除语言的全民性。因为语言在阶级斗争中，可以被无产阶级拿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宣传、斗争工具，也可以被资产阶级拿去作为资产阶级宣传、斗争的工具。作为宣传、斗争工具的语言，对待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辽宁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1960年第2期，57页）正是由于在这种论点中，存在既想把语言说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又要极力避免说语言有阶级性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林彪、“四人帮”破坏语文工作，煽动极左思潮时，正好利用了这个矛盾，把他们蓄谋已久的“语言有阶级性”论赤裸裸地端了出来，用以作为破坏语文工作、打击语文工作者的大棒。这个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汲取的。它再次证明了，“左”或右都必然造成理论上的重大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真理向前多走半步就会成为谬误，而理论上的谬误往往正是阶级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事业的手段。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弄清语言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目的在于清理语言学中左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促进我国语言学的繁荣和发展。在贯彻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系列有关的指示中，语言学界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有必要对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加以回顾，诸如有关批判继承的问题，对待国外语言学的问题，发展我国不同的语言学派的问题，语言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汉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方法和步骤问题，等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我们坚信，这样的回顾和总结，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论“语言美”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几个单位响应党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号召，在1981年2月25日联合发出倡议，在全国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做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倡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变社会风尚，建设精神文明的殷切期望。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有一个秩序井然、和睦友爱、清洁卫生的社会环境。这是建设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也是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迫切需要。因此，这项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五讲四美”活动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行动的口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推进“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我们应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探索如何在全国通过“五讲”手段，早日达到“四美”的目的。我们应该对“四美”的每一项内容制定普及和提高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要求，并解决如何达到这些要求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广大语文工作者，应该就“语言美”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就是对“语言美”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语言美”的重大意义

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建设不成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即使物质生活丰富了，国家富强了，如果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极不健全的，不可能得到巩固的。我们绝不能走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老路。因此，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提，并把它作为新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历史任务。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这样作就充分肯定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和作用。马列主义从来就认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有发达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高度的精神文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而物质文明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所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二者缺一不可的。

“五讲四美”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美”是“四美”的重要内容，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只有把“语言美”放到建设高度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中，才能真正看清“语言美”的重大政治意义。

从当前我国现实生活着眼，提倡“语言美”也有非常积